

目 录

contents

本期专题 · 2021 年全国“两会”

编者按：蓬勃的希望春天升腾，奋进的力量在心中激荡。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不负重托、履职尽责，为实现“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凝聚起不懈奋斗、开拓进取的强大力量。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举世瞩目。会议期间，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参加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深入交流、共商国是。从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到深刻阐述高质量发展内涵和要求，从号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增进民生福祉的思考与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两会上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聚焦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彰显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统筹协调的系统思维、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为推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从时间看，“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第一年。这个时间节点独一无二，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至关重要。

从空间看，“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在国际上，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此前我们依靠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模式不可持续。构建新发展格局，把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只有把国内市场大循环做起来了，才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是“十四五”要重点破解的问题。

本期推出“2021年全国两会”专题，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通过对此次2021年全国“两会”的会议内容与重点进行梳理与分析，在总结我国今年经济、政治、社会、民生等方面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大计等方面开展前瞻深入研究。希望能为盐城市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思索和方向。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 02 如何看今年的GDP增长目标
- 04 在历史交汇点上看“三新”
- 05 2020年国家账本
- 07 渐进式延迟退休如何“小步慢走”

政坛经纬

- 09 构建清晰化的碳排放总量年度目标

经济纵横

- 13 2021年将是中国经济的大年

文化漫步

- 18 让教育“焦虑”少一些

悦读时光

- 封三 公务员考试“35岁限制”讨论

主 管：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黄兴港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盐城银河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1年3月16日

印 数：8000-8200

如何看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 GDP 增长目标为 6% 以上。此前，受疫情影响，2020 年并未设置 GDP 增长的具体目标，因此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备受关注。怎么看今年经济增长目标？2021 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增长动力来自哪里？思客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分析今年设定 GDP 增长目标背后的考量。



如何看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

刘元春：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设定为 6% 以上，这是在去年 2.3% 经济增速基础上，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退以及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所制定的一个宏观调控目标。

这个调控目标体现了几点：第一是底线原

则，“6% 以上”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常态运行，把好基本盘的基本增长速度。同时，它也体现出系统性原则。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维持在 6% 以上的状态下，才可能保证一些基本的参数，比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能够达到 5%-7%，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可能达到 8%-9%，政府财政收入也能够达到 7%-8% 这样的水平。这个水平是能够保证我们各个市场主体相对平稳健康运转的数据，也是我们开好头、起好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扎实的数据。因此，我们不要简单地理解 GDP 这个参数，它蕴含了一系列的系统性信号。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要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 以上”的目标，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参数，原因在于我们今年依然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以及目前整个经济增长复苏的基础不扎实，因此也不易给出过于确切的数据。

第三，现在要按照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来进行中国经济的整体布局，因此我们就不能够简单地按照经济单一指标来宏观治理，必须要给予其他宏观治理目标一个很好的空间，比如在控风险、促改革的战略布局上面要有空间，这样才能够使我们有更多的力量，通过创新、改革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量、多元化发展目标更好达成。

第四，今年 GDP 增长目标设定为 6% 以上，很重要的一点是与明年能很好地衔接。这样我们的整个经济调控就有保有压，能够具有连续性和可控性，能够按照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进行布局。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自哪里？

刘元春：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来源有以下几点，第一是我们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新旧动能的转换，呈现出高技术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向上气势，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带来无接触经济快速的发展，带来目前中国高技术行业的蓬勃发展。

第二，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发展格局的重点是要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型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于基础研究的投放，同时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所以我们在技术创新、科技创新这一块，应该能够有很好的收获，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很重要的最直接的来源。

第三，向改革要动能。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十九届五中全会进行了很多的战略部署，这当中改革开放依然是主要动能。这两年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一些重点领域的机制体制，特别是政府责任转变这些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这些成绩将会转化为我们这两年在资源配置中的能量。

第四，今年保增长的动能在于我们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宏观经济政策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会使内需有一个释放的过程。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实施一系列的举措，那么在消费、投资领域都会有结构性的变化，从而在总量上有明显的增长，在短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动能。所以把这几个中长短因素结合在一起，我

们应该有很好的信心来保证完成今年 6% 以上经济增长速度。

2021 年，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刘元春：第一个挑战依然是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特别是海外疫情输入性的问题，依然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不确定性，是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到底如何，这决定了我们整个外需的状况。第三是中美关系到底会走向何方，这里面依然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第四个不确定性是，我们过去一系列的调控政策和非常规的疫情防控政策产生的一些风险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第五个是就业方面。在目前恢复性增长的过程中，要想大规模地解决就业依然存在着问题。所以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对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着墨很多。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刘元春：实际上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对这些风险都进行了高度的关注。比如针对疫情，国家已经进行了全面的部署。针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全球经济动能的减弱，国家已经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这个布局就是要正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来开展一系列的战略举措。

政府工作报告也集中体现了我们短期的布局 and 应对，同时对重点领域的改革，重点领域的风险，进行一一的部署。

当然在目前这种全世界结构大变异，中国结构大转型的时代，我们肯定还面临着很多的“黑天鹅”事件。这些“黑天鹅”事件决定了我们在宏观调控中要坚持底线思维。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6% 以上，有些人表示不理解，因为有些团队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 8% 以上。之所以设定在 6% 以上，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考虑到大量的不确定性，考虑到大量的潜在风险，而这些因素我们很难在它隐藏阶段就得以有效发现和有效应对。因此，

(下接第 20 页)

在历史交汇点上 看“三新”

3月5日下午，在参加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必须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着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这三个“新”，是理解当下和未来中国的三个关键词。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国人深刻理解这“三新”，才能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外界深入了解这“三新”，才能更好地读懂中国。

中国发展，历史方位清晰。新发展阶段，是中国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新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30年将是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目标宏大，但它不会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能实现，必须积极有为、努力奋斗。因此，中国不仅在规划未来5年发展，更在擘画未来15年远景，将今天的努力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中，锲而不舍向着既定目标砥砺前行。

中国现代化建设，指导原则明确。在新发展阶段，必须把握和践行新发展理念。要看到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是

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的中国，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部门层面，无论是省级层面还是省以下各级层面，都在努力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理念的把握和落实，必然带来实践的创新和丰富。

中国经济现代化，路径选择分明。新的历史课题需要新发展理念引领，也需要新的方法来破题。党中央从战略高度谋划，决定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出发的必然选择，也是增强中国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必由之路。各地各部门的发展背景、条件和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关键就在于找准自身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总书记这次在内蒙古代表团特别强调，内蒙古要“深入分析自己的优势领域和短板不足，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和主攻方向”。能否从具体实践出发，因地制宜提出新方法、运用新手段，考验着各级各地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的开局之年。理解中国的三个“新”，才能理解中国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展现的定力和底气。

(2021-3-7 海外网)

2020 年国家账本

2月26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新书发布暨高层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编制了2000—2019年共20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系统勾勒了21世纪头20年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全貌,为全面把握中国发展、进行国际比较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样本。

谢伏瞻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的资产负债表,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宏观经济治理数据库建设。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与编制既是完善经济核算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谢伏瞻表示,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国家的大账本,通过它可以对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国家资产负债表为评估一国债务风险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为衡量综合国力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统计基础。

谢伏瞻强调,要持续推进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进一步完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数据库的建设,在国家治理的数据基础设施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要加强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充分利用存量数据,推进相关分析,在国际比较以及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视角重塑宏观经济分析范式方面取得新的成果;要在国

家资产负债表研究领域建立国际话语权,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利用这些数据充分展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叙事。

2020 年我国财富积累超过 700 万亿

国民财富是居民、企业、政府三大主体的财富合计,其中每一个主体的财富都是其非金融资产和净金融资产的合计,即所有资产和所有负债的差额。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表示,预计2020年我国的财富积累超过700万亿,远高于我国GDP;2000—2019年,中国社会净财富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6.2%,名义GDP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2.8%,财富增速远快于名义GDP增速(更快于实际GDP增速)。由于GDP是流量指标,财富是存量指标,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流量赶超”已经让位于“存量赶超”。这主要源自两方面贡献:较高的储蓄率和价值重估效应。较高的储蓄率直接对应较高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各部门的固定资本形成带来了非金融资产的每期增量。同时,由此带来的土地增值、股票、房地产价格上涨等因素均促进了存量资产的市场价值上升,即价值重估效应。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提出,国民财富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核心指标,它比GDP更加适合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国民财富分配结构既包括国民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间的分配结构,也包括在居民部门内部、企业部门内部和政府部门内部的分配结构,它比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更能反映资源在不同部门间分配的实际情况。

新的分析方法和视角

对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现实指导意义，李扬表示，国家资产负债表不仅是一个账户体系，而且是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基于它可以有很多新发现。将之用于金融分析，可以分辨出“期限错配、货币错配、资本结构错配以及清偿力缺失”等多种金融风险，从而加深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寻找更为切实的应对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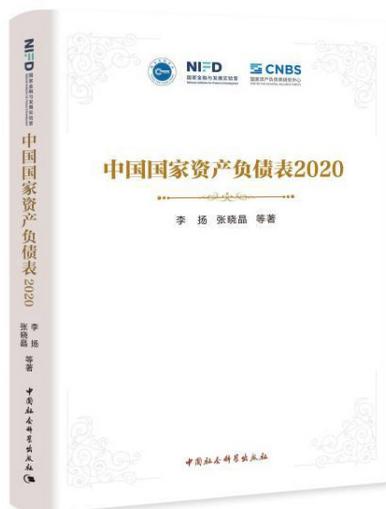
李扬进一步指出，就债务论债务没有意义，因为只有分析债务的用途，才能形成一个分析债务的全面架构，不至于以偏概全。基于资产负债表，我们才能发现，中国债务增长的同时也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资产，而这些资产的收益完全可以覆盖债务。另外，基于资产负债表，还可以分析社会的净财富规模及其分布。比较研究显示，当前我国政府掌控的净财富规模超过美国，这使得中国有更大的空间和韧性来应对各种冲击。

除了经济分析的方法外，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国家资产负债表还是观察经济社会的一个视角。以往GDP、投资、消费、储蓄等概念都属于流量，流量是存量的变化，如存量增值、存量减值、存量形态转换。而如果从存量的角度观察经济社会，就可以把收入、支出、储蓄、消费、投资、金融、实体经济等概念统一起来，将宏观、微观以及看似对立的东西统一到更一般的认识框架中，其不仅有助于观察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研究金融问题、社会问题、政府问题及财政问题的重要视角。

对于未来的后续研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建议，可以从资产的角度思考资产的价格变动。资产价格的变动包含两部分，一是储蓄投资，二是价格溢价。未来有必要区分清楚，资产是实际投资形成的，还是资产溢价。

张晓晶建议，未来需要进行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包括优化政府和居民间的配置，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在信贷配置方面尽快取消

政府的隐性担保、打破刚兑，以市场化定价为基准来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最终让市场清理机制发挥强制性作用，打破国企信仰，逐步形成市场化风险定价体制。



要对政府资产进行更有效的配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资产配置的内容是经营和管理资产，具体分为可市场化、不可市场化和混合三类。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政府购买来完成的属于可市场化；需求方为社会，具有公益属性，不能通过契约进行交易或者可以通过契约进行约定，但因保密需求而不能进行契约约定的属于不可市场化；既有可市场化部分，也包含不可市场化部分的属于混合类，即某一个服务或产品既有商业性，又含有不能通过市场化来解决的属性。针对这三类属性应有三种不同的目标、资产使用者和管理方式，即政府的活动、市场化的企业的活动和准市场化的企业的活动。

许宪春认为，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储蓄的分配结构，国民储蓄的分配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财富增量的分配结构，所以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对国民财富增量的分配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想保持合理的国民财富分配结构，必须保持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渐进式延迟退休如何 “小步慢走”

延迟退休是近年来社会各界一直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表示：实施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目前，人社部正会同相关部门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何为渐进式延迟退休？世界各国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如何让“政策”走稳，避免新的矛盾？

何为渐进式延迟退休？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指从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那一刻起，每过一年或几年调整一次，每次延后退休年龄几个月，逐渐延迟到预期的退休年龄。

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每年延迟三个月，四年能延迟一岁；另一种是每年延迟四个月，需要三年时间延迟一岁。

从国际上来看，延迟退休年龄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近几十年来，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退休年龄，目前世

界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普遍都在65岁以上。

据了解，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岁左右提高到了2019年的77.3岁，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近70年未有调整。

因此，延迟退休也是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有专家表示，在“十四五”期间，有一个非常严峻的“窗口期”，1963年“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马上就要满60岁，这会导致我国养老保险中缴费人群迅速减少，领取人迅速增加。还有专家表示，随着中国人口平均年龄的增长，过早退休也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关于延迟退休，大家在担忧什么？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关系到全体公民利益，综合来看，大家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自己工作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调查显示，许多70后对这一问题最为敏感，因为他们是最有可能第一批面对延迟法定退休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表示，“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系列图书目前共出版4本，《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是继2013、2015和2018之后出版的第4本。本书数据充分反映了21世纪前20年中国经济如何从“流量赶超”向“存量赶超”的转变，有助于准确

把握国家经济的健康状况，也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等编著。

(2021-3-3-3 中国社会科学报)

龄的人。还有一些重体力劳动者，对于能否承受延迟退休后的劳动强度也颇为担忧。

二是部分观点认为延迟退休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挤压效应”。不少人表示，对于传统行业和事业单位来说，几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年人不退休、不离岗，那么新人想要转正、升职，肯定会有一定的难度。

还有一种观点，担心延迟退休有可能影响到女性生育子女的意愿。有网友表示，本来女性 50 岁、55 岁退休之后，刚好可以替子女带小孩，减轻年轻人的压力。如果女同胞需要工作至 60 岁、65 岁才能退休，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替子女分担压力，此后，年轻人恐怕更不愿意多生育孩子。

不过，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特聘专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看来，年纪大的人占据的主要是一些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延迟退休的目的是把一批有丰富经验的人保留下来。而随着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新出现的高技术、高知识、高智慧的岗位，绝大多数都是给年轻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也认为，老年人就业和年轻人就业存在很强的互补关系。因此延迟退休不会对年轻人的就业带来“挤压效应”。

针对大家关心的延退后养老金待遇问题，也有专家表示我国养老金水平跟个人累计缴费年限、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个人账户金额等因素有关。目前，我国养老金的发放原则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也就是说，延迟退休之后，工作年限长了，相应的缴费年限长了、养老保险缴存多了，养老保险待遇是增加的。

渐进式延迟退休如何“小步慢走”？

从国际上来看，延迟退休年龄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但各国在退休年龄设定、养老金财政保障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在借鉴国外经验、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不少专家提出“选择性退休”可以作为起步过

渡阶段的政策安排。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选择性退休的实质是把退休年龄选择的自主权交给个人，通过养老金调整机制强化对个人自主选择延迟退休的有效激励。

他表示，应当鼓励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不同退休年龄和养老金领取方案，如劳动者在正常退休年龄前选择提前退休则减扣一定比例的养老金，在正常退休年龄后延迟退休则增加一定比例养老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指出，“选择性退休”兼具弹性和自主性，虽然取消“一刀切”的法定退休年龄，但依然需要设定正常退休年龄作为自主选择的基本参照。

他建议，可以只设延退起始年龄，不设上限年龄；到了起始年龄，延不延退、延退多长时间，由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决定；不设延退上限年龄，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依据主客观情况，签订包括用工时间的延退合同。

也有一些专家呼吁，针对不同行业、工种实施差别化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一些工种，比如说重体力劳动者，如煤炭工人，如果非要延迟到 60 岁以上退休，并不现实。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各个工种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意愿，比如说医生和教师等群体可能更倾向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2021-3-5 央视新闻）

构建清晰化的 碳排放总量年度目标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的主题为“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的内部研讨会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如果想做好绿色金融、碳市场，就需要进一步使总量目标清晰化，并建立一套有关碳金融和绿色金融中的参数、指标体系及计量、测算的框架，这样才能切实做好各项任务规划和投资引导。”碳达峰、碳中和这个题目很重要，我也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在很早前就被卷入到这方面的讨论之中。现在我挂着博鳌亚洲论坛的头衔，博鳌亚洲论坛历来关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对“30•60”碳目标的实现尤其重视，也准备在今年的论坛年会和一系列配套活动中安排讨论。



朱隽和马骏两位同志的发言都讲得很好，特别是把绿色金融和碳排放结合在一起讨论很有意义，我个人也很受启发。我想借此机会重

点讲一下，“30•60”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关总量目标进一步清晰化。

“30•60”碳目标体现了我国在碳排放领域的重要转变

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主席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他又多次强调并践行这一科学理念，也扭转了过去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大家知道，在这之前，我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相对消极的，主要强调不能抑制经济增长，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承诺约束性硬指标。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中国“30•60”碳目标，在国际上做出了中国的承诺。这是一个值得深刻理解和落实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表述上的微调或者政策上的延续式更新，而是理念上、认识上、立场上的转变，是需要我们深刻学习领会，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付诸实践的。

目前，我们在行动落实上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这两年国内煤电项目还呈现较强的扩张势头，国际上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些煤电项目的融资仍有中国的参与。这都表明，要深刻认识并践行“30•60”碳目标并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转变过程。

另外，中国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包括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和推行，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挑战。一个首要挑战是需要有实现碳目标的

更加清晰化、透明化的总量指标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可以让各方对碳目标有清醒的认知，同时也能为诸多相关工作提供可度量、可计算、可考核的任务。当然，这也是这不容易做到的，还需要各有关部门积极工作，真正实现理念、认识和行动上的转变，并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对碳排放的数据和目标作出可靠的计量来推动碳目标的实现。

实现碳目标需要以碳排放总量目标清晰化为前提

在2020年12月12日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30·60”碳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几项总量指标：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些分别对应着碳排放强度、碳汇和新能源发展。

以上总量目标非常重要，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工作中，需要很多微观的数量化指标和数据基础，但确定微观数量化指标的前提就是要有总量目标：有了总量目标，才能清晰化解出微观目标。总量目标还关系着“30·60”碳目标的工作进程安排，工作进程需要均衡，既不能过于前松后紧，也不能过于前紧后松。

此外，碳目标实现需要依靠激励机制，并不是下达了目标任务就一定能落实为成果，而激励机制也要在总量目标清晰的基础上才能被计算、设置和完善。一些国家在碳排放的总量控制规划上已经给出清晰的数量目标，中国也需要在总量目标上作出更为透明、可读的计量，才能有助于社会各方理解并落实为行动。

削减碳排放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分别作用于促进供求平衡的两端。一种是限制现有的碳排放，类似于过去粮食供给不足时，居民靠的是粮票配额，也就是压需求；另一种是投资于

供给方，形成低碳或零碳新能源供给来达到平衡。我个人认为，今后几十年，实现碳排放目标会主要依靠这种投资，要通过大量投资促进新能源供给和提升节能、低碳的使用。

既然需要投资，就需要计算未来的回报。公共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要求回报，但公共财政资金通常比较紧张，因而要大力促进民间投资，也就必须要明确计算投资的未来回报，这就需要未来每年碳排放的总量数据更加清晰，毕竟很多微观数据指标的计算就取决于总量目标。此外，在实现碳目标方面我们未来的投资规模需要有多大，还应该对应于每一年GDP，即每一年GDP中需要多大比例来投资于应对气候变化。

对投资的激励可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通过配额交易或者碳税来获取并体现回报，也就是说碳排放多的主体应该交出一部分资金来支持减排投资；另一个是通过一般性的动员把投资引导到这个方向来，没有额外的政策补偿。我个人认为，未来大部分投资激励应该来自于第一种方式。

因此，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使碳排放过多的行为，特别是重点行业、企业，通过碳配额交易或碳税来承担责任并支持大规模的减排投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这一均衡价格只能在总量目标之下平衡出来。

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还不够统一，存在分割，各市场碳价格不一致，也给定价带来很多问题。因此，要实现碳价格一致，既要总量目标清晰，也需要各个碳市场实现联通和统一。

在推进碳排放配额交易和碳税的过程中会出现成本转嫁现象，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多消耗排碳能源就必须多承担代价，就是要通过这种转嫁来实现资源配置的转变，才会有更多的新资金投资于减排和绿色金融领域。

不过，转嫁过多也可能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国内居民可能会有意见。成本转嫁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嫁多少合适，这涉及到总量碳目标、

通胀目标等多目标之间的权衡，但是不允许转嫁是不对的，不能把这种转嫁当作缺点。

未来的减排任务有一部分要依靠公共投资，而公共投资的结构是一种资源配置，因为这部分公共投资如果不是用于碳减排，可以用于提供包括医疗、社保等公共品和福利。

既然涉及资源配置，就需要在数量上明确公共投资多目标与预期要实现的目标之间有无缺口，有多大缺口，从而校正财政和其它公共政策，并规划出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比例关系。前面提到，习近平主席在国际上作出的碳减排承诺体现了我国的一个重要转变，而要实现这个转变很不容易。事实上，在若干年之前，国内对于碳排放的主流观点是强调不能因碳减排而影响发展，与其相关的定量方面的论点主要强调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只说强度，强调碳排放强度应该与GDP增速相关联，这意味着如果中国GDP增长快，那么排放就可以多一些。第二，强调均值，也就是人均排放的概念。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排放量与西方国家相比还不是很多，也就有更大的排放余地。第三，强调累计，也就是历史累计碳排放量。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开启得很早，历史上已排放了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也还有较大的排放空间。

这些说法实际上都倾向于抵制减排。温和一点讲，它与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实际上存在矛盾。因为到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无论你的经济增长快还是慢，人口数量多还是少，累计排放规模大还是小，都要求达到净零排放。因此，在实践中，迫切需要碳排放总量目标的更加清晰化，这就要求各有关部门认真体会、实现转变和紧跟步伐，来为实现碳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作好数量型行动规划。

碳排放总量目标的核算基础

习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了我国在碳排放强度、碳汇和新能源方面的目标，特别是第一项关于碳排放强度的指标，即到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这涉及到如何选用现存统计数字和如何定量规划未来的问题。但由于核算基础不实，包括缺少官方权威统计数据 and 重要参数，现在这几个指标的度量还不可能清晰。

首先，我国2005年当年及其后至今的年度碳排放总量有若干种口径，均来自学术机构和国际合作项目，但似乎找不到官方权威数据。在核算上，如果要实现203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65%，首先要得知2005年的碳排放是多少。在这一数据上，我们发现各方数字不尽一致，而且这还涉及到究竟谁应是权威提供方。有部分研究引用了2005年中国碳排放约78亿吨，考虑到森林碳汇吸收了大约10亿吨排放，因而2005年总的碳排在67-68亿吨的水平。如果此数据准确，再结合当年的GDP来看，2030年要达到的目标排放量上限就大体可以计算出来了。但这个碳排放总量数据并不权威，只是一家之言。比较多一些的文獻所引用的2005年中国碳排放规模是55亿吨上下，有的说是53.8亿吨，有的说是56亿吨，基本上围绕55亿吨这个数量。

其次，要考虑GDP的可比性。如果要测算2030年的碳排放强度，当年的GDP要具备与2005年的可比性。2005年的名义GDP大约是19万亿，但这是当时的价格，并非与2020年及2030年可比的GDP，为此需要用GDP平减指数换算成可比的年度GDP。了解当今（即2020年）的排放总量也是重要的，以便认识过去15年我们实现了多少，未来10年的步伐需要加快多少。我看到一个比较好记的说法是，中国2020年的GDP大约是100万亿，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00亿吨。如果以2020年作为基年（以此为基年在计算上相对容易），推算2005年的可比GDP大约是30万亿，用这一排放强度乘以65%，得出2030年碳排放强度上限。

总之，要在可比 GDP 口径下使此蓝图清晰化。

第三，在 2030 年总量目标（碳达峰）的核算上，既然对外仍提供的是排放强度指标，则 2030 年碳达峰时的排放规模还取决于今后十年 GDP 增长的假定。GDP 增速的快慢不同，会使 2030 年碳排放总量的计算得出一个区间。还是以 2020 年作为可比基年，假设未来十年年平均 GDP 增长率为 5%，2005 年可比 GDP 约 30 万亿，则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就是大约 101 亿吨，就比现在多 1 亿吨左右；如果以年平均 GDP 增长率为 6% 来计算，2030 年碳达峰时的碳排放总量则是 111 亿吨，也就意味着再往后 30 年的减排任务会更加艰巨。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测算，到 2030 年碳达峰时碳排放约是 105-106 亿吨的水平，那么他们对年平均 GDP 增长率的假设大概是 5.5% 左右。所以，在 2030 年碳达峰之前，碳排放的逐年总量控制规模 and 如何安排规划任务及测算碳价格，实际上并不清晰，有待进一步做实。第四，总量核算还依赖于碳汇和风电、太阳能发电的核算问题。关于森林等绿色植被的碳吸收规模，刚才提到，有人测算 2005 年是 10 亿吨左右，相对于当年的碳排放而言，碳吸收还是相对较少的。如果未来我国大面积植树造林，到了 2030 年，即便碳吸收规模达到 15-20 亿吨，相比碳排放而言仍是相对比较小的。我们目前对碳汇的计量也不够清晰，比如什么样的、多大面积的森林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参数不齐。

此外，到 2060 年，可能我们还不能实现对化石能源的完全替换，会有些残留领域（如电力调峰等）还继续使用化石能源。根据清华大学能源环境与经济所的测算，到 2060 年化石能源占总能源中的比重还会有 13%，这换算成碳排放绝对数值还是很大的。而使用这些能源造成的碳排放，要通过碳汇或者说碳沉降来吸收才能实现碳中和，同时还需要依靠新的碳吸收技术的发展，也包括发展碳捕获碳存储（CCS）等来抵消。这些都需要大量基础数据、

权威参数去测算，以便对碳排放总量的减项做到心中有数。

至于风与太阳能发电，由于这类装置年发电小时数较少，且需与储能或调峰能力相适配，故还要把装机容量转估算为电能供应占总发电电能的比重，才能有效测算电力行业的减排进程。总之，如果想做好绿色金融、碳市场，就需要进一步使总量目标清晰化，并建立一套有关碳金融和绿色金融中的参数、指标体系及计量、测算的框架，这样才能切实做好各项任务和投资引导。

带配额的市场经济及其一般均衡

有人质疑并担心，较多设置配额是否会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特别是排放配额量大面广，大范围影响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既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也给行政性设置并分配配额打开方便之门。

应该说这种质疑不无道理，但可以使用带配额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这种经济系统。说来话长，其结论大致是：在配额总量约束下，如果让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配额价格并实现市场分配，仍会实现有配额的一般均衡，即价格体系会有所移动，但仍是由市场体系所决定的，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仍可依旧运行。言外之意是，如果配额价格及分配不由市场来决定，包括总量约束不清晰，则会对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产生若干未知的影响。

从资源配置上来讲，碳市场和整个资源配置的关系实质上体现为有配额的一般均衡。为什么要注重有配额的一般均衡呢？首先，有配额就要有分配，就有价格或隐含着某种价格。如果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它并不影响对整体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解和其可计算性。

另外一方面，从历史实践上看，我国过去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经验。上世纪 80-90 年代，中国的外贸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纺织品出口，而当时在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存在出口配额制度，也就是在关贸总协定主持的“多种纤维协

2021 年将是 中国经济的大年

李稻葵 2 月 19 日在央视财经“十大顶级经济学家看宏观大趋势”系列节目中，所作《“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怎么干？》主题分享。以下为部分内容精编。



2021，中国经济大年

2021 年，总体来讲是机遇大于挑战的一年。用更简单的语言，我觉得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是个小年，2021 年可以形容为中国经济的大年。

为什么这么说？有 3 件重要的事：1. 疫情后，中国有一个反弹的优势，尤其是消费方面有反弹动力。2.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起步之年，所以会出现一系列重要的新项目、新举措，尤其是在科技、减碳等方面，将会拉

动经济增长。3. 相对于过去一两年，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逐步转变。特朗普折腾半天后，最后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白宫。拜登这位新总统以及他的团队，跟中国的沟通将会比之前更加畅通。他们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判断更加符合实际。

而 2021 年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将会有这么几个确定性的脉络：首先是消费有望反弹。2020 年是消费非常低迷的一年，疫情导致许多家庭足不出户，无法实现消费计划。至少按

定”（MFA）之下、主要由发达国家所设置的若干类纺织品配额，因此也就产生了中国如何分配纺织品出口配额的问题。那时在机制上允许采用市场交易方式拍卖配额。这种配额拍卖就与现在所说的碳市场中的碳配额交易是可类比的。

所以，回顾我们过去的一些工作和当时做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碳市场和整体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强调

的是，这种有碳配额的新均衡的实现，还是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的力量来实现，而且要着重考虑跨期的一般均衡。前面提到减排主要依靠投资，而投资只有跨期才能取得效果。但跨期投资决策要依靠对未来数据的预测，要依靠未来的价格数据来指导当前的投资，所以未来清晰的总量指标和各类参数都是非常重要的。

（2021-3-10 财经杂志）

零售来算，是负增长的。

另外由于疫情，许多家庭、个体的收入是下降的。而从根本上讲，对绝大部分家庭而言，制约他消费增长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收入。

我讲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家里的音箱有时候要是不用了或者不喜欢了，就会在互联网平台上卖掉。我发现特别明显，当疫情严重、收入下降时，二级市场卖得非常慢；但一到年底，经济稍微恢复、发奖金时一下子交易就活跃了。

许多年轻人确实是想消费的，但就差一点点钱。所以就要想方设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提高？1. 增加就业。要减少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的税收，因为减少对企业雇人的税收后，或多或少会惠及员工。我举一个例子，现在一个稍微正规点的企业要雇一个员工，如果每月工资 1000 元的话，总成本大概是 1400 元，甚至是 1500 元。这个 400-500 元是他劳动相关的税收和费用。这个费用应该下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去提高收入。2. 拉动消费，形成一个消费热潮。回顾改革开放，我们不断有消费热潮，比如最开始是买家电，后来是买汽车，再后来是买房子装修。现在中国的消费热点不算多，所以政府要想办法营造出一些热点。比如新能源汽车，要让城市里和高速公路沿线的充电桩、快充桩变得非常多。这样就能鼓励大家从传统能源车换成新能源车。因为新能源车确实好开，但充电是个痛点。

2021 年，大概率地，由于有了防控的措施、经验、疫苗，等等。疫情应该不至于大规模反弹。事实上，我倒倾向认为到 2021 年 6、7 月份时，疫情会在全球范围内逐步离我们远去，经济、收入将能恢复正常。许多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在今年有望有一个恢复性的上升，消费也能够上来。另外，各种各样的新科技，包括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还有互联网的应用、新基建投资，在 2021 年恐怕将会是一个加速前进的态势。所以对投资而言，今年也是重要的一年。

时代变了，别再为了投机去买房

疫情后，买房子会有一定刚需的上升。因为在家宅了很久后，对自己的房子可能会有一些新想法，想装修也好、换也好。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但我还想强调另一点，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一个人口正不断跨地区流动的状态中，从农村到城市，从小镇到中等城市，从中等城市到大城市。因为在不断流动，所以总体上讲，老百姓还是希望能够换房子或者是买房子的。

所以这轮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压力，主要在一些重点地区、大中型城市、大中型城市中的热点城市，比如像南方经济好的、就业好的、年轻人愿意去的那些城市，那儿房地产的价格就会上升。我的观点首先是应该高兴。因为房价上升代表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在往上走，里面是有刚需的。有了刚需才能带来其他投资需求。而针对这些城市房价上涨的压力，我的看法是应该在供给侧想方设法地找出路。具体来说，一些热点城市的住宅用地一定要增加。只有增加以后，老百姓才不会焦虑，才不会着急地想要去炒作房子。这才是稳住房价的根本。

与此同时，经济潜力不是特别好、人口也不怎么增加的一些地区，要控制它投机性的需求，防止房价涨太高后回落对经济产生影响。这是房地产的一个特殊情况，它是结构性的、区域性的。所以我想呼吁有关部门，一定要把这个路子搞对了，千万别搞反了，不能去压需求，应该是增加供给。还有一些人问我，房地产是不是一定会涨？我倒是不太同意这么一个简单的说法。因为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跟 10 年前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不能说房价在每个地方都不会下跌。因为，中国经济的地理结构正在出现重大变化。比如像深圳、东莞、佛山等地区的人口还在流入，就业市场非常兴旺。

不仅如此，还有一个“火上浇油”的因素是，这些地区的有关部门往往“舍不得”拿土地出来搞住宅，宁愿拿土地去搞产业，要么是搞互

联网，要么是工业，或者是其他的商业。他们觉得做商业省心，未来可以收税，同时不会带来过多居民，商业业主也不会要求办学校、收垃圾；但反过来，要是弄一个小区事儿就很多了，又要幼儿园，又要清洁，又要治安，等等。

所以我跟很多地方政府的人聊天，他们的计算是非常“聪明”的，说拿土地出来搞住宅比较麻烦，要是搞一些商业、办公楼的话，好日子万年长。这是个问题。这种激励必须得改变。针对这种想法，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要出台政策，给予对冲。否则热点地区的房子涨了只能靠人为的方法来压需求，而非热点地区的房子又卖不出去。

所以我提醒大家，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是新时代，绝对不能假设房价永远会涨，一定要认准地区。而且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为了投资、投机去买房子。

算一笔账，从现在的房价看，买卖房子有各种税收，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远不如理财甚至其他的投资方式，所以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认真分析，绝对不要拍脑袋，绝对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推导未来。

但另一方面，我想不仅是“十四五”期间，恐怕未来10-15年，房地产依然是一个支柱型产业。因为，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人口在不断流动，我们都有买新房子、提高住房水平的需求。而且房地产背后所蕴藏的，以及它所带来的经济活动量是非常大的。我给大家算一个数字，如果把中国经济按国家标准的22个产业来划分的话：1. 农林牧副渔。都跟吃饭有关系。2. 零售和批发。许多互联网平台进入零售和批发是很有道理的，抓住了一个大产业、大方向。3. 金融。现在中国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维持在8%左右。4. 跟房地产密切相关的建筑业。房地产对国民经济还是至关重要的，不光对中国重要，在美国那样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仍然也非常重要。在美国，过去看宏观经济走势基本

就看几个产业，一个是地产，一个是汽车，还有一个就是航空，一般看这3个。现在可能还看一些高科技，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讲，房地产仍然是一个支柱型产业。有人说，目前我们到了一个“房住不炒”，和股权投资及其他金融投资并重的时代。但我还是想提醒各位，中国股市还是有它自身发展的逻辑的，也蕴含着自己的一些风险。简单说几个基本事实：1. 尽管中国股市最近涨了这么多，但中国股市的市值相对于GDP的比重还不是那么高，应该远不到100%。我没看最新数字，推测大概在80%左右。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的股市市值不是太高，但我们的广义货币是GDP的2.2倍。用2.2倍的流动性去买还不到1倍GDP的股票。股市就容易波动。2. 股票市场的发展还需要完善。坦率来讲，现在的问题是，那些特别激动人心的股票还不在于A股上。

首先我认为A股是有发展潜力的，像2020年全球最火的几大股票，有好几个是中国的，包括在美国上市的蔚来汽车，好几天的交易额都是全球第一。还有其他的很多例子，包括腾讯、京东等。但这一轮全球涨得最快的股票，大部分都不在A股。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要改革，过去我们资本市场种种掣肘太多，导致这些成长型的公司没有条件在A股上市。所以中国股票市场，就像中国的许多运动项目一样，很有潜力，但还没有发挥出来。在这种时候，就请大家一定要谨慎，同时不要有时特别乐观、有时又特别悲观。

警惕美国的“回头浪”

在当前全球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发达国家股市高歌猛进。我记得去年3月份，美国疫情刚开始时，美国股市有好几次熔断。结果美联储无条件、大规模地注入流动性，股市很快就起来了。但在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是什么股票起来了呢？一定要看清楚，不是所有股票都起来了，起来

的是那些给投资者带来了想象空间，而且市值比较大的股票。

像特斯拉，8000 亿美元的市值远超第二名 1000 亿美元的丰田。它就是满足了两种特性：有想象空间，大市值。所以大家一哄而上，交易额非常大，进得也快、出得也快，很多人就在赌它。反过来看，一些传统的股票并没有怎么涨，比如通用汽车和福特。大概几个星期前，有人讲下一轮该通用汽车上涨了，结果涨了一点又回去了。

这就是流动性过剩的第一个后果：发达国家的股市里资金扎堆，不是抱团取暖，而是抱团做梦，大家都在抱团畅想未来。另外，流动性过剩后美元贬值，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就是人民币升值。这个道理也很简单，美国的流动性一过剩后，很多资产，尤其是国债这些标准的资产利率下降。在利率下降的过程中，他一看中国的利率挺高，资金就反过来从美国流动到中国了。

由于资金部分地从发达国家流入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价格也在上涨。对此，我们一定要做好两手准备：第一，如果美国等经济体拼命地增加流动性，经济还没恢复的话，它的利率就没有空间可降了。这时，我们要保持灵活性，利率不要跟他降得太快，要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利率。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是“武器”多一点。第二，要小心美国经济突然有回暖的苗头。我认为最有可能是在今年下半年，这时它的货币政策就有可能调整，有可能收缩流动性。美国本土的经济就会活跃，活跃后它的实体经济就需要流动性来支撑。这时资金可能就会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回回美国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可能性。如果不做好充分准备的话，会被回头浪打得很疼。而在这种充裕的流动性下，很多人开始讨论“输入性通胀”。

这个确实是今年的不确定因素，或者说是风险点之一：第一，原油价格有不确定性。像

这几天美国天气很冷。很有意思的是，天气一冷很多美国家庭烧的是油，而不是天然气。我在美国生活过，他们有很多老房子，地下室有一个锅炉连着管子，有车子每周运油过来。所以天气不好，油价会上涨，波动性很大。另外，油价有国际政治因素，由于石油生产非常集中，就那么 5、6 个地区。所以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一点问题，全球原油的供应链就会受到影响。第二，金属矿。像铁矿石一个重要的生产点是巴西。巴西铁矿石的蕴藏量是非常多的，但它对环保的要求非常高。有时候还搞一刀切，比如巴西政府对自己的矿企淡水河谷要求非常高，动不动就让必须搞个什么工程。所以淡水河谷的生产能力经常上不去，而且只要一出安全事故、环保一收紧，整个全球铁矿石的价格就往上涨。第三，贵金属。比如用来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锂、钴。马斯克就说了，现在新能源车的瓶颈在电池，电池的瓶颈就在这些贵金属。像钴是用来防止电池爆炸的。据我初步了解，钴一般就只有一两个地方生产，就在刚果那儿。最后一个就是芯片。现在芯片成了一个资源型产品，不仅是美国卡中国脖子，现在全球芯片都吃紧，芯片生产能力跟不上。因为现在就连台灯、电冰箱也都弄一个芯片，更不用说新能源汽车了。我最近买了一辆国产新能源车，结果软件更新后转向灯不转了，拖到原厂一查说有个芯片坏了。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现在新能源汽车用的芯片量远超传统能源汽车，以至于整个汽车行业的许多车厂现在都停产了，就是因为芯片跟不上。所以芯片今年不仅是涨价的问题了，而是产能跟不上会制约许多企业的发展。所以种种迹象都告诉我们，今年可能会是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的态势。

未来 5-10 年，中国经济调整的一大主线

最后讲讲产业链、供应链。去年疫情期间，我们可能都被一个幻觉所迷惑了。什么幻觉呢？疫情期间，中国的出口在全球中的占比

是上升的，达到 14%，创历史新高。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的许多企业仍然是最靠谱的生产企业。因此很多人就讲，产业链不会外移，国际上都还是相信中国的。但其实这是幻觉。因为疫情期间很多国家顾不上这些，他首先要“保命”，要保证经济运行，所以他暂时先不会管产品来自何方，只要是他自己生产不了的就行。而到了今年下半年，如果疫情真的能逐步远离世界的话，许多发达国家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把一部分生产企业吸引回自己的国家去。不仅是为了贸易平衡、就业，他们其实心知肚明，必须要保证一定的经济自给自足的能力。他们其实也很讲经济安全。

所以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出现一个趋势，一部分企业从中国搬回发达国家去。咱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该走的你也留不住，要适应这个趋势，既不要责怪自己，也不要过分地去对冲这个趋势。对此，我觉得：1. 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要去梳理各个产业有哪些环节是自己还不能控制的，要把这个短板补上。2. 一定要有核心技术。还有一些不一定是核心技术，但是很关键的零部件。我举个小例子，比如电阻。电器里面都有电阻。但我告诉大家，好的电阻我们自己生产不了，基本都是日本和德国生产的。比如制造一个高级音响或精密仪器，噪音要低，这个电阻还得要进口。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阻不值得干，日本人做的很好，可以买那就无所谓。但疫情改变了我们，特朗普也教会了我们，所以我们还得去培养一批隐形冠军，倒不一定是高科技，而是把一些关键零部件做出来，这样我们整个产业才能够升级。3. 希望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土地成本较低、资源丰富的一些地区，像西部，能够把东部的一些产业接过来。比如一些比较成熟的产业，不需要追着消费者偏好跑，需要不断去搞研发的产业，应该转到西部来。

在这种产业调整、变迁的背后，则涉及到了中国经济未来 5-10 年，甚至是 15 年，最主

要的一个调整主线：经济地理的再布局。这是什么意思呢？像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我们的人口布局在不同地方，而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经济活动。这个结构我们称之为经济地理。

它是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的。反过来经济地理的变化也会推动经济变化。两者是同步的。比如说，1000 多年前，那时我们主要的经济活动聚集区还在中原一带，到了最近几百年才逐步地转移到江南。像小说《三国演义》里，最后曹操的魏把蜀吴灭掉了，背后实际是经济因素。三国时，经济活动中心在魏国这个地方。诸葛亮《出师表》里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四川这个地方经济条件不好，要是不主动进攻最后肯定是死路一条，必须放手一搏。

从三国后到北宋，经济活动中心就逐步挪到了江南，再往后挪到广东。所以说经济的发展，是跟着人口布局、人口流动、人口迁徙的整个布局同步的。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总量大约翻了 8 番，相当于过去 1000 多年的经济变化，但目前我们经济地理的布局是相对落后的，面临着一个上千年的经济地理再布局的压力。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东北一带。现在人口增长不如其他地区快。很多人就认为人口少了，经济一定会下滑。但我的想法是，不能这么想。

我曾反复强调，我们国内市场大循环，不可能所有产业都集中在某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所以一定要帮助东北发挥潜力，找到他们自己新产业的发展方向。

比如，东北整体经济规模不是说一定要跟广东同步，这个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东北经济规模也许增长得慢一点，人口相对少一点，但人群的生活水平最后还不低，还在上升，甚至比一些南方地区还高。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那该怎么帮东北发挥潜力呢？想一想它能发展什么新产业。除了农业外，大型装备制造业还是有潜力的。我们横向对比一下，美国、德国的许多大型装备制造业发展得好的地区，

让教育“焦虑”少一些

教育是民生之基，是社会公平的底线，寄托着千万个家庭的希望。当下，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旺盛间的矛盾，催生出了令学生、家长、学校无奈的“教育焦虑”。“起跑线”焦虑、择校焦虑、作业焦虑、升学焦虑……“教育焦虑”始终排在社会热点话题前几位。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教育界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也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这些问题都属于社会性问题，不是教育部门单独可以解决的，需要社会各方面、各

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研究解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努力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对此，教育界代表委员感触深、思考多，对于如何化解“教育焦虑”，还教育以清新健康的氛围，他们给出了实招。

破“鸡娃焦虑”：靠优质均衡的教育服务

学英语、学奥数、练书法、下围棋，孩子课外补课、培训已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在“不甘人后”的焦虑下，家长不断给孩子加码，这种给孩子“打鸡血”的教育方式如今在网络上有一个专属名词——“鸡娃”。

也都是天寒地冻的地方。

我举个例子，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是全球第一大重型机械卡特彼勒的总部。我去过那个厂，一望无际。这种工厂在土地成本较低、气候条件不是太好的地方，是可以发展的。再看德国，冬天也是很冷的，但他们北边也有很好的产业，像钢笔万宝龙就是在汉堡一带搞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对东北没有信心时，想一想世界经济是怎么发展的，德国是怎么发展的，信心就来了。我特别不同意一个观点，说东北的营商环境不好，东北的文化不适合经商，这是宿命论的说法。营商环境是内生的，通过改革、招商引资是会改变的，要有信心打破这个宿命

论。事实上我们回忆一下，1999年时沈阳的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比今天美国底特律还困难。

为什么沈阳能扭转局势？就是引进了一个汽车项目，财政、税收的1/3都用于经营这个项目，并带动了周边的配套产业。类似的项目，如果东北地区能引进一些的话，经济体就火了。所以总的来说，有些地区经济总规模增长快，其他人口流出地区的人均GDP、人均收入不能掉队。这样一来，就能使全国老百姓不管去哪里，收入都能同步地提高，这是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

(2021-3-9 正和岛公众号)

面对“起跑线”不断前移，家长焦虑、孩子无奈的“鸡娃”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政府教育总督学潘惠丽忧心忡忡。“我见过许多家长和孩子课外进行辅导学习，孩子很快乐、很自觉；也见过很多不开心的孩子，这多半是因为家长没有充分尊重孩子意愿和需求，一厢情愿强加课外补课，甚至补的科目过多、过难造成的。”潘惠丽委员说，“我个人主张要尊重孩子的特点和成长需求，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做引导式的补充。”

“鸡娃”焦虑，根源还是当下教育发展存在短板。潘惠丽委员坦言，目前，学校教育还不能充分满足每个孩子个性化教育需求，在对孩子不同特点的针对性教育上仍有欠缺。随着家长素质的普遍提高，对孩子教育愈发重视，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教育优质均衡的期盼也越来越强。

目前，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仍不充分。“虽然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已大幅提升，但城乡和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仍有较大差异，‘择校热’热度难降，校外培训火爆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胡卫认为，“十四五”时期，基础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坚持公益性前提下，创新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构建起服务供给新格局。

为此，胡卫委员建议，通过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推进城乡一体化办学，推行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扩大供给新渠道。与此同时，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优质学校及优秀师资的辐射引领作用；引入社会教育力量，培育服务新业态，大力发展“互联网+教育”，促进各类教育资源互联共享。

破“作业焦虑”：靠科学规划的家校分工

“不做作业母慈子孝，一做作业鸡飞狗跳”，这是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的现象。此前，中小学生学习作业繁重，一些学校还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学生和家长都感到有负担。

2月23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受到学生家长欢迎。

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十分理解孩子和家长的“作业焦虑”。他认为，明确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同定位，家校协同发挥作用是减轻负担、化解焦虑的关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对此，邵志豪代表深有体会：“家庭教育不应该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应该与学校教育协同育人。”

“家庭教育的最大特点是综合性，核心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与习惯。”邵志豪代表建议，对于学校，应统筹作业时长，减少学科类作业，特别是针对考试的重复性、机械化训练的作业，适当增加开放性、创新性、探究类、拓展类活动作业；对于家庭，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发展特点，一方面补短板，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强优势，在家庭教育中找到学生的兴趣和个性优长。

“家长焦虑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学校也有焦虑。”潘惠丽委员说，“家庭教育要以情感为纽带，以言传和身教为重点；学校教育要回归德智体美劳的系统培养，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厘清家校教育的边界，加强家校合作，建立起一个相互促进、相互监督的共同发展的环境。”

破“教育内卷”：靠久久为功的社会合力

教育评价在教育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指挥棒”和“加速器”作用。但现实中，评价导向偏离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出现了“内卷”现象——以考试代替评价、以分数代表能力，唯分数、唯升学情况严重，导致从学生、家长到学校的普遍焦虑。

破解“五唯”顽瘴痼疾，教育评价改革势在必行。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新

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任任务书和路线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胡卫委员今年的提案，就是关于变革教育评价方式、破解教育“内卷”的建议。在他看来，现行教育评价体系重结果轻过程、重分数轻素质，应试倾向强烈、过于突出选拔，忽略了学生的成长和全面发展。

“评价是为了不评价，评价应当重在促进学生自觉主动、愉快幸福地成长。”胡卫委员认为，必须深入变革教育评价方式，使教育评价回归其本源，真正发挥好“指挥棒”正向功能。他建议，推行量性与质性相结合的全面评价模式，逐步降低考试量化分数在评价中的比重，更加重视过程性评价，改变选拔中的唯分数取向，将学生在全学习过程中的综合表现同样列为重要评价指标。

扭转“五唯”的评价导向，除了教育部门

对评价制度体系进行改革，还需要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形成对育人导向、教育规律的全新认识。

“化解教育焦虑，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共同理性看待这个问题。整个社会对育人导向还得达成更多的共识。”潘惠丽委员建议，家庭、学校、社会加强沟通，注重孩子基本品质、价值观等核心素养的培养，营造和谐友好的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在‘十四五’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段里，构建对学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这是改革的重点。”潘惠丽委员说，全社会需要形成合力，真正地尊重教育规律，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评价制度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把孩子们培养成为身心健康、有学识、有创造性的一代新人。

(2021-3-11 光明日报)

(上接第3页)

需要保证我们的宏观调控有它的弹性，有它的韧性，有它的空间安排。

6% 以上的 GDP 增长目标，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

刘元春：到 2021 年，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比重估计能够达到 19% 左右。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能够达到 6%，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接近 1.5% 这样的水平。这个水平对于目前整个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无疑是一个增长的引擎，是一个稳定的压舱石。

所以说中国经济稳定是保证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及相应市场稳定的一个核

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进行很多新布局，要根据新发展格局来进行新的国际合作，构建新的竞争力。因此我们还将持续地通过多边协议、周边开放，来为与中国市场密切相连的一些经济体提供直接的发展基础。

同时，大家也会看到世界金融出现超预期的一些波动，例如近期围绕着美元和美国 1.9 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金融市场的预期开始出现大幅的震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无疑对这种金融波动起到很好的锚定效应。

(2021-3-8 思客)

